

折氏家族研究

李裕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西安 710062;作者,男,58岁,教授)

摘要 折氏属党项族,是宋代唯一长期世袭知州的家族,在宋灭北汉及宋与辽、夏、金的战争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成员曾进入最高权力核心。折氏在与汉族通婚中逐渐汉化,又在宋代崇文政策影响下,由世代尚武向文武兼长转化。宋朝廷对其采取特殊的优惠与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关键词 折氏家族 家风 婚姻 丧葬
分类号 K810.2

折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族,属党项族,世代尚武,占有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一角之地,在宋、辽、夏、金角逐的舞台上活跃了200多年。宋代最重视清除割据势力,为什么会容许这样一个特殊家族存在?它的经济、家风、婚姻、丧葬等有什么特点?它怎样影响着社会,社会又怎样影响了它?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折氏家族,戴应新写过《折氏家族史略》一书,公布了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墓志,并作了初步探索。本文利用这些材料,结合宋代文献作进一步研究。上篇从纵的角度分阶段研究,下篇从横的方面作专题性探讨。

上 篇

折氏家族的历史,依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可分六个阶段

一、折氏家族的兴起(唐末至950年)

党项族,在隋末唐初居住于今甘、青、川交界区。贞观以后,在吐蕃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北迁至陕、甘、宁交界区。^①中唐以后,一部分党项族又东迁至今陕、蒙、晋交界区。其中势力最强的两支便是拓跋氏(即李氏)与折氏,拓跋氏后来建立西夏,与折氏成为死敌。折氏的领袖折宗本,在唐末的战乱中崛起,被任命为振武军绿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宋会要辑稿》方域21之一,下引此书简称《宋会要》)振武军,唐乾元初建,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领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榆林南)、麟(今陕西神木县)、胜(今内蒙托克托)等州。《宋会要》方域21之一)

收稿日期:1997-10-14

^① 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年1期。

折宗本死后,子嗣伦(862~911)就任麟州刺史,^①管辖范围缩小了。后归附于晋王李克用,晋王在其家族所在地设立府谷镇,后唐天 七年(910)升为府谷县,第二年以县建府州。折嗣伦碑称他能“持戎丑,疆境之内,民无杂居,杜烽成之虞”,“勋业惟新,敷五教以在宽,阐六条而弥政,稼穡有通政之咏,庶民无聚敛之怨”。^②碑文难免有溢美之处,但至少可以反映他不仅有抵御外族侵扰的将才,也有团结部族、安定民心、经营农牧的能力。

折嗣伦子从阮(892~955),是这一时期折氏家族最杰出的人物。20岁为河东牙将,后唐同光时任府州刺史。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奉送给契丹,府州也落入契丹手中。契丹为了直接控制府州,要将折氏强行迁往辽东,从阮坚决拒绝,重归后晋。正逢晋、辽关系恶化,从阮奉命北征,于开运二年(945)占领胜州,《辽史》卷《太宗纪》、《旧五代史》卷8《晋少帝记》)升任本州团练使兼振武军节度使。从此,折氏与契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四月,府州升为永安军,从阮为节度使兼领“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乾 二年(949),“举族入觐”,从阮调任武胜军节度使,镇邓州,子德 任府州团练使。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从阮加同平常事,四月移镇滑州,八月移陕州,次年十一月移 州,三年五月,奉命平定庆州野鸡族。显德元年(954)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郑国公,七月加兼侍中,次年去世。《旧五代史》卷12《折从阮传》、卷99《汉高祖纪》、卷113《周太祖纪》、卷114《世宗纪》)从阮成为后周显贵,原因在于折氏家族领有府州,是一支站在后周立场反契丹、北汉的武装力量。

以上折宗本、嗣伦、从阮三代奠定了世袭府州的基础。

二、助后周、宋平北汉(951~979)

951年,郭威建后周王朝,刘崇在太原建立北汉政权,投靠契丹,与后周为敌。折氏则归附于后周。北汉待折氏不薄,为何折氏不愿与北汉友善?这是因为折氏与契丹为世仇,北汉臣属契丹,与其立场完全相反,更兼折从阮身在后周境内为官,其势不能不作这样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使折氏立即面临严峻的形势,府州与契丹、北汉交界,易受夹攻,而距后周中心甚远,难以得到增援,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生存。折氏在这严酷的考验中培育出两名大将:折德 与折御卿。

折德 (917~964),曾任马步军都校,949年为府州团练使。952年2月,北汉大举进攻府州,折德 勇敢迎战,消灭北汉军2000人,随即乘胜渡黄河,占领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显德元年(954),北汉乘周世宗刚继位,联合契丹军南下攻潞州(今长治),周世宗在高平将其击败,直攻太原。折德 率师配合,攻占河市镇,斩北汉军五百余级,至太原城外朝见周世宗,世宗于府州重建永安军(汉乾 三年已罢),以德 为节度使。《宋史·折德 传》、《资治通鉴》卷292)

折德 地位的上升,引起势力更大的党项首领李彝兴的不满,他任定难军节度使,领有夏、银、绥等州,控制着府州通往中原的道路。显德二年正月,李彝兴下令不许折氏使者通过,这等

①《折嗣伦碑》云:“享年五十,终禄于麟郡。”未说卒的时间。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版)15页以为“死在李克用死前二三年即951年左右。”按碑载嗣伦卒时,从阮为府州副使,府州建于911年,即后唐庄宗天 八年(《资治通鉴》卷284注引宋白《续通典》)。又《旧五代史·折从阮传》云:“弱冠居父丧”,从阮生于892年,弱冠则为911年,可证嗣伦之卒当在911年。

②《折嗣伦碑》、《折氏家族史略》,第54页。

于逼折氏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折、李矛盾该如何处理？后周宰相认为夏州是边防重镇，府州偏小，不妨舍去，周世宗则从上下关系考虑，折氏一贯忠诚，从战略角度看，保全府州，可以夹攻冯汉，于是下诏谴责彝兴。彝兴当时羽毛尚欠丰满，在朝廷压力下，被迫谢罪。《资治通鉴》卷292折氏通道虽然解决，折、李矛盾依然存在，折氏事实上处于契丹、北汉、夏州三大势力的包围之中，简直无法安枕。显德三年3月，周世宗征南唐返京时，折德晋京迎谒，要求迁入内地，这当然是保全折氏家族的万全之计。周世宗则考虑府州地位重要，又是蕃汉杂居之地，折氏是当地大族，深得民心，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因而不准内迁，给予优厚赏赐，命他返回府州。此时，代理州事的折德愿在沙谷砦（在今保德境）大败北汉军，斩其将郝章、张钊^①，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实力。

赵匡胤建立宋朝，折氏即归附于宋。折氏希望宋廷早日平定北汉，这样可以打通通往中原的道路，摆脱孤立无援的困境。建隆元年（960）五月，折德主动向北汉进攻，占领沙谷砦，斩首五百级。第二年入朝，“陈太原可取状”，宋太祖给予优厚赏赐，并允诺“尔后子孙遂世为知府州事，得用其部曲，食其租入”。^②事实上确认了其近乎藩镇的地位。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北汉发兵数千攻打府州，折德奋勇作战，生擒汉将杨。《长编》卷4卷5，《宋史·折德传》。子御勋（938~977）知府州，曾三次朝觐宋太祖，后病卒。弟御卿知府州。

折御卿（958~995）是一员能干的武将，知府州时年仅19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征太原，三月，命御卿与监军尹宪攻岚州。四月一日，御卿打败岚州千余名北汉兵，七日，攻破岢岚军，生擒军使折令图。十八日，攻占岚州，杀死宪州刺史霍翊，擒夔州节度使马延忠等。《长编》卷20。五月五日，北汉主刘继元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向宋投降，折氏在平北汉一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抗击契丹的折氏家族（980~1004）

宋太宗灭北汉后，立即向辽进攻，以收复幽云，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此后宋辽战事不断发生，折氏经常在侧翼发挥作用。太平兴国七年（981）五月，辽3万骑分三路伐宋，东路攻高阳关，中路袭雁门关，西路直逼府州，折御卿在新泽寨打败西路军，“斩首七百级，擒酋长百余人，获兵器羊马万计”。《长编》卷23。

至道元年（995）正月，辽大将韩德威率万余骑自振武军南下，折御卿率骑兵在子河汉邀击，斩首500，获马1000匹，杀敌将20余人，俘吐浑首领1人。《长编》卷38，《宋会要》方域21之二。

咸平二年（999）十月，辽攻宋遂城、瀛州等地。十一月，府州知州折惟昌与宋思恭等发兵渡黄河，入五合川，攻破辽言泥族拔黄太尉寨，焚器甲、车帐数万，斩千余级，夺回被辽掳走的300余人。^③《宋会要》方域21之三。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军大举伐宋。十月四日，折惟昌率部自火山军攻辽朔州界，攻破

①《宋史·折德传》记见世宗事只说：“时世宗南征，还次通许桥”，未点明时间。考世宗曾两次南征南唐，一在显德三年正月出征，五月返，二在四年十一月出征，次年四月返。两次都有可能，而第一次与李彝兴塞其通周路时间更近，可能性更大，故暂定此事于显德三年五月。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下引此书简称《长编》），《折继闵神道碑》载《折氏家族史略》第67页。

③“言泥、拔黄太尉寨”，《宋史·折德传》作“言泥族拔黄砦”，《长编》卷5作“巴罕太尉寨”，按“巴罕”当即“拔黄”的同音异译。

大狼水寨,生擒数百人,获马牛羊铠甲数以万计。围攻岢岚军的辽兵害怕归路被切断,连忙撤军。《长编》卷 58,《宋会要》方域 21之五)十二月,辽宋议和。

四、长期与西夏苦战的折氏(1005~1124)

折氏与党项李氏(即拓跋氏)矛盾由来已久,淳化五年(994)至道元年(995)、咸平二年八月、九月、景德元年二月曾多次交战,互有胜负。《长编》卷 39 卷 45,《宋会要》方域 21之二、之四,《宋史·折德 传》)1038年,元昊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夏间经常发生战争,折氏也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先后涌现出折继闵、折克行、折可适等一批优秀将领。

折继闵(1018~1052)字广孝,喜读兵书,能攻能守。1039年任知州。次年(即康定元年),元昊进攻延州(今延安),大败宋军,俘虏大将刘平等。继闵奉诏三次出兵牵制敌军,斩获两千。《折继闵神道碑》)庆历元年(1041)春,宋将任福率重兵攻夏,全军覆没,形势恶化。七月,夏兵数万围攻麟州,不克,又围攻府州逾月,折继闵与宋将率官军 6100余与居民全力防守,激战数日,杀敌千余。《宋会要》方域 26之六,《涑水记闻》卷 12,《宋史·折继闵传》)夏军又转攻丰州,八月十九日,攻陷丰州,又四出钞略,切断麟州与府州的联系。十月,继闵率兵近 2000人给麟州护送军衣,在中寨遭万余夏军袭击,败退。《长编》卷 133,《涑水记闻》卷 12)

庆历二年(1042),继闵与张亢统兵 3000为麟州护送军粮,途中被数万夏军包围,继闵奋勇突围,在险隘处留下精兵数百,当敌骑追过险隘,即回身与伏兵夹击夏军,斩首 700,夺马 500。三月,为加强麟、府间联系,重修建宁寨。《折继闵碑》,《宋史》卷 324《张亢传》)九月,夏兵围镇戎,在定川攻杀宋将葛怀敏。继闵奉命捣敌空虚,在 泊打败夏军。三年冬,夏兵攻掠清寨等堡,继闵乘敌归时,追战之,斩首 400,夺回所掠物品。《折继闵碑》)

庆历四年,宋廷为是否放弃麟、府发生争议,这几年麟府各城寨几乎都被夏兵攻陷破坏,居民流散,麟、府之间交通被切断,戍守困难,仁宗派欧阳修实地考察,欧阳修从战略高度考虑,不能放弃,并提出具体建议,被仁宗采纳。《宋会要》方域 26之六,《长编》卷 148庆历四年四月己亥)此后数十年较为平静,继闵及其后任继祖、克柔尽力招抚流民,恢复农牧生产。熙宁七年(1074),府州发生灾害,克柔向朝廷借粮赈济。《长编》卷 258熙宁七年十二月甲戌条)此举既说明他关心民户,也表明府州经济凋敝,已无力自救。

元丰二年(1079),折克行(约 1040~1107年)出任知州,他英勇善战,早在熙宁三年宋夏在环庆发生战争,克行率兵 3000护饷道,在葭芦川打败夏军,斩首 400,招降千户。《折克行碑》,《宋史·折克行传》)元丰四年,西夏内乱,宋乘机出兵五路伐夏,夏将咩保吴良率万骑袭击克行部,克行乘敌半渡险隘时出击,杀死咩保吴良。十月十七日,攻克宥州。二十一日,遇敌千余,败之,斩 900余级。《涑水记闻》卷 14,《长编》卷 318元丰四年十月癸酉、甲戌条,《折氏家族史略》87页引《折克行碑》)次年四月、九月,连败夏军于青冈岭、厮罗川。六年三月,在三角川斩夏将吴理保。《长编》卷 334元丰六年三月戊戌条,《折克行碑》)元 二年(1087)、六年,克行先后在怒摩川、折水川打败夏军。绍圣三年(1096)护修葭芦城。元符二年(1099),进筑宁边等堡,从此麟府与 延相连,不再孤立。《宋史·折克行传》,《折克行碑》)大观元年(1071)卒。《宋史》称其“在边三十年,善拊士卒,战功最多,羌人呼为折家父。”

与克行同时,折氏还涌现一位善战的将领折可适(1050~1110),他是从阮五世孙,克行的族侄,长期在环庆、泾原、熙河一带任职,与夏多次作战,累立战功,官至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

渭州(甘肃平凉),《宋史》卷 253 有传,是府州知州以外折氏唯一在《宋史》中立传者。

五、抗金战争中的折氏(1125~1139)

抗金初期,折氏出了两个名人,一是最后一任府州知州折可求,一是官至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朝廷最高领导集团的折彦质

折可求,大约在政和七年(1117)任知州,^①是一员善战的将领,政和年间,累立战功,宋徽宗赐以忠勇之旗。宣和元年(1119),童贯又上奏其战功(《折继闵神道碑》),他统率的军队号称折家军。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十八日,金左副元帅粘罕南下包围太原,可求率兵 2 万援救,经岢岚州,至天门关,遇金兵据守,转而取道松子岭,至交城,被以逸待劳的金兵打败,退屯汾州(今汾阳)。(《三朝北盟会编》卷 25)

靖康元年(1126)七月二十七日,可求领兵北上,赴太原解围,在文水郭栅被金兵打败。八月十八日再战,又败。九月三日,金兵攻占太原,可求退守府州。(《三朝北盟会编》卷 50)

建炎元年(1127),可求奏改府州靖康军为保安军。(《宋会要》方域 6 之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7,下列此书简称《系年要录》)次年十一月,金将娄宿攻占延安,府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娄宿派人劝降,许以关中之地,可求遂以麟、府、丰三州降,又为娄宿说降晋宁军未成(《系年要录》卷 18 建炎二年 11 月壬辰。按折可求降金事,《三朝北盟会编》卷 120 在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金史》卷 3《太宗纪》在三月二日戊辰,《宋史》卷 2《高宗纪》作建炎二年十一月。说降事,见《宋史》卷 44《徐徽言传》,范浚《香溪集》卷 2《徐忠壮传》)。三年十二月,与娄宿联合攻打陕西。(《系年要录》卷 30,《宋史》卷 448《李彦仙传》)建炎四年,金人商议扶植伪政权,可求与刘豫同在考虑之列,最后听从实权派拈懒意见,立了刘豫。(《金史》卷 7《刘豫传》《拈懒传》)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拈懒废刘豫,事前,左监军撒里曷曾向可求许愿取代刘豫,被拈懒否决,撒里曷怕可求怨而生变,于八年九月用计将他毒死。九年三月,西夏乘机攻占府州,可求之子彦文携家奔河东。(《系年要录》卷 122 卷 127,《宋史》卷 2《高宗纪》卷 48《夏国传下》熊克《中兴小记》卷 23 卷 24 记可求死于七年十一月,夏占府州于八年三月,李心传以其失之过早,而据张汇《节要》及《两国编年》纠正之)西夏恨折氏长期抗夏,将折氏墓捣毁。

折彦质(约 1080~1160)字仲古,是彦适次子。崇宁时中进士,(《元一统志》卷 4《折彦质传》)是折氏家族中唯一的进士。才兼文武,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围攻开封,彦质与大将姚古、种师中率兵勤王。(《宋史》卷 34《姚古传》)六月,宋以李纲为河东宣抚使,率大军解救被金兵围困的太原,纲不懂军事,以彦质为勾当公事。(《三朝北盟会编》卷 48)七月,彦质随制置副使解潜自威胜军(今沁县)出兵,至南关与金兵交战,四天杀伤相当,后金人增兵,宋兵失利。(《三朝北盟会编》卷 51,《宋史》卷 2《钦宗纪》)李纲免职,九月,太原失陷。十月五日,彦质以“知兵”升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三朝北盟会编》卷 57)十一月十二日,金兵至黄河,彦质领兵 12 万出战,次日失利。十五日,彦质被贬官,永州安置。(《宋史·钦宗纪》,《宋会要》职官 69 之二十九)金兵渡河,闰十二月,攻占开封。绍兴二年(1132)六月,复龙图阁直学士,十二月为湖南安抚大使兼知潭州。(《系年要录》卷 55 卷 61)四年六月改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十一月为枢密都承旨。(《系年要录》卷 77 卷 82)金将

^① 政和六年四月,折可求之兄可大尚在知府州任上(见《宋会要》职官 41 之一百三十),折克行葬于政和元年(见折惟忠妻《李夫人墓志》,《折氏家族史略》98 页),葬后第八年,即政和八年,知府州已为折可求(见《折克行碑》),则可求初知府州很可能在政和七年。

彦质在开封的子女 7 人送至府州,《系年要录》卷 85 绍兴五年二月癸未)以此箝制彦质。五年闰二月,彦质为工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谋军事,为抗金出谋划策。《系年要录》卷 86 六年二月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与抗战派宰相赵鼎、张浚共掌朝政。十二月赵、张政见不合,张推荐秦桧,挤走赵,折也随之免职。《宋史》卷 21《宰辅表》,卷 28《高宗纪》,《系年要录》卷 98 绍兴六年二月甲寅、壬戌、卷 107 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丙午)第二年九月,张以处理军务失误免,赵再相。一年后赵被秦桧挤走,彦质于绍兴七年十二月起用知福州,九年二月免。《系年要录》卷 117 绍兴七年十二月癸酉,《淳熙三山志》卷 22)后以谴责秦桧投降行径,连遭贬逐。《宋会要》职官 76 之 51)而“刚直之气不少屈”,自号葆真居士。《元一统志》卷 4《折彦质传》)秦桧死后,于二十六年(1156)正月,重新起用知广州,八月改知洪州(今南昌),二十七年十二月罢,三十年卒于潭州”。《系年要录》卷 171 绍兴二十六年正月戊申,卷 174 八月壬辰,卷 178 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丁巳,卷 185 绍兴三十年八月癸丑)“彦质每以家世忠节不得归中原为恨”。《元一统志》卷 1《折彦质传》)著有《葆真居士集》《时政记》等。

六、折氏的衰落

北宋灭亡,府州被西夏攻占以后,折氏已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军事势力。它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系折彦质后裔,其中有彦质之子知常。知常字子明,乾道九年(1173)时任将作监丞,前往浙西处理出卖营田等事。《宋会要》食货 5 之三十五)淳熙七年(1180)六月,时任成都府路提点刑狱、权知黎州,因部落来攻,戍军作乱而遁,八年正月免职,汀州居住。《宋会要》职官 12 之二十八、《宋史》卷 3《孝宗记》)与朱熹(1130~1200)为友,曾请朱熹为其父撰碑文,朱以受庆元党禁之祸,复书婉辞。《朱文公文集·续集》卷 7《答折宪(名知常)》,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 6《答折子明》)娶知泉州范如圭长女为妻。《朱文公文集》卷 94《范直阁墓记》)家中藏有旧石本乐毅论,《朱文公文集》卷 80《跋旧石本乐毅论》)看来已弃武习文。又有折知刚,淳熙间任泉州通判(同治《泉州府志》卷 26)淳熙十五年四月至泉州南安九日山祈风,登山泛溪,^①疑为折知常之兄弟行。

折氏家族大多留在北方,尚武者较多。如折彦若,继闵曾孙,投伪齐,阜昌八年(1137)任吴堡寨主兼将。(吴堡摩崖刻石,载《折氏家族史略》第 115 页)折彦颜,天兴二年(1213)正月,崔立发动政变,自立为太师、尚书令、郑王,以彦颜知开封府^②。折彦文,可求之子,曾知晋宁军(今陕西佳县),北距府州 100 多公里,彦文力图匡复府州,引起夏兵侵扰,金朝廷为了平息事态,命彦文迁知青州(今山东益都)。《金史》卷 12《张奕传》,《西夏记》卷 24)还有一位折某,曾任麟州知州。元好问《续夷坚志》卷 3 楷石方条载:“繁峙王文汉卿得此方于麟抚折守,折守得于国初洛阳师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按《元一统志》云:“金皇统八年(1148),以麟府地陷西夏,不曾复立。”《元一统志》卷 4,神木县条)则此折某知麟州应在金初,但折可求,享年不过 60 来岁,此折某当为可求同辈之人。

南宋、金代,折氏任知州一级官员者虽不乏其人,但再没有世袭之事,也乏知名人物。可以说折氏离开了世袭的府州,意味着丢失了根据地,失去了他所控制的蕃汉民众,失去了地处三国要冲的特殊条件,也就失去了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武的特长不能充分发挥,文才又难于和文化发达的南方竞争,因而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① 见泉州南安九日山石刻,载宋:《宋史研究论丛》(一),第 162 页。

② 刘祁:《归潜志》卷 1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29 页。

宋、金以后,由于杨家将故事、小说、戏曲的影响,佘太君成为民间传颂的杰出人物,折氏家族又以这位女性形象知名于世。

折氏后代虽缺乏名人,其分布地域愈来愈广。在清代,岢岚仍有其后人,县城西北三里建有折家祠。《光绪《岢岚州志》卷2》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之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惜书中未记录碑文,难以确证是否为杨业之妻。现在岢岚有佘、摄二姓,均为“折”的同音改字。^①为何改为摄,已难查考。岢岚折氏应为折德愿的后代。现在府谷、神木、榆林、佳县、米脂等地均有折姓居民,系折氏家族的后裔。

下 篇

一、知州传袭的特点

府州知州从折从阮到折可求,共7世14人,其传袭特点有五:

1. 除一、二世外,多为弟继兄位。为什么不直接传子?这是因为他们年寿不高,从已知7人享年看,平均44.8岁。他们死时,儿子尚小,而知州与皇位不同,他需要有能力强率蕃汉各部抗击辽、夏,年龄太小,是无法胜任的。《折克行碑》说得很清楚:“初,公(指克行)当承袭,太尉公(指继闵)以公幼(按当时克行9岁),表授其弟继祖。”至于折从阮直接传子,则是因为他年寿较高(64岁),其子知府州时也已33岁。

2. 上文说多为弟继兄位,但与商代的兄终弟及制不同,他们没有让所有兄弟轮流承袭,如折继祖熙宁四年死时,弟继世尚在世,继祖并没有传其弟,而传子,因为此时,子克柔已年过30,而弟继世已到暮年,第二年便去世了,从统兵打仗角度考虑,年迈当然不及青壮年合适。

从习惯上看,折氏崇尚的是父子继承制。上引折克行碑说父继闵死,克行“当承袭”是一例。再看继祖死,“其子当袭州事”,只是继祖特意上奏“请授其兄子克柔,朝廷从之”,克柔才袭位。从此例结合表一,还可以看出,兄弟承袭之后,绝不再传给长兄之子,一般传给最后一位当知州的兄弟之子,唯继祖例外。

3. 何时传袭?一般帝王、藩镇都是前任死,后任继位,折氏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死后继任7例,占半数。因病改任4例,调任者1例,撤职者1例。最后1例降金,无继任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免权掌握在朝廷手中,朝廷让他们世袭的目的在于御敌守边,而不是单纯享受特权。

4. 初任知州的年龄,确切可知的7例,最小19岁(折御卿),最大33岁(折从阮,折德),平均26.4岁。如将大体可以推测的6例一并计算,则最大者约37岁,平均28岁。这是驰骋疆场的最佳年龄。

5. 在任期限,没有限制,最长者28年(折克行),次为25年(折从阮),最短2年(折惟正),14人147年,平均每人10.5年。宋代规定,知州任期3年,事实上往往不到2年,如潮州在305年中知州知姓名者156人,姓名不详者二三十人,平均每人任期仅1年半。^②折氏平均任期相当于一州知州的3~7倍。

^①《岢岚县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619页,第720页。

^②参李裕民、黄挺:《两宋潮州知州考》,《潮学研究》(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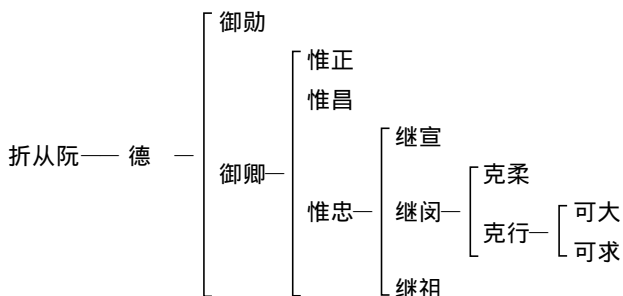
表 1 知州传袭表^①

表 2 历任知州比较表

姓名	生卒年	享年	任职年龄	任期	在任年数	卸任原因
折从阮	892~ 955	64	33	约 924~ 949	25	移镇
折德	917~ 964	48	33	949~ 964	15	去世
折御勋	938~ 977	40	27	964~ 976	12	入朝得病
折御卿	958~ 995	38	19	976~ 995	19	去世
折惟正	约 976~ 997后		约 20	995~ 997	2	病入朝
折惟昌	978~ 1014	37	20	997~ 1014	17	去世
折惟忠	约 982~ 1033	约 52	约 33	1014~ 1033	19	去世 ^②
折继宣				1033~ 1039	6	撤职
折继闵	1018~ 1052	35	22	1039~ 1050	11	病
折继祖	1020~ 1071	52	31	1050~ 1071	21	去世
折克柔	约 1040~ 1079后		约 32	1071~ 1079	8	病 ^③
折克行	约 1043~ 1107	约 65	约 37	1079~ 1107	28	去世 ^④
折可大	约 1079~ 约 1116	约 38	约 29	1107~ 1116	9	去世 ^⑤
折可求	约 1090~ 1139	约 50	约 28	1117~ 1129	12	降金 ^⑥

① 数字表任知州顺序。

② 《长编》卷 113 明道二年 (1033) 十一月癸亥朔：“府州言：简州团练使折惟忠卒。”《折氏家族史略》第 21 页作景 初卒，误。

③ 《长编》卷 296 元丰二年 (1079) 正月丁亥，“以知府州折克柔弟西头供奉官克行为礼宾使知府州。先是克柔以目病乞致仕，仍乞以克行承袭。诏克柔与官观差遣而有是命。”《折氏家族史略》第 27 页作元丰元年，误。

④ 《宋会要》仪制 11 之 25 “秦州观察使折克行，大观元年 (1107) 四月赠奉国军节度使。”赠官一般都在死后一二月内，据此知克行之卒当在大观元年春，《折氏家族史略》28 页作“大观年间 (1107~ 1110) 病死”，不确。

⑤ 《长编》卷 493 绍圣四年 (1097) 十一月戊辰：“麟府都巡司准备勾当，西头供奉官折可大迁一官为 门 祗候，以帅臣上战功也。”此年前可大已任职，此时又以战功晋升，则其年至少已 20 岁，以此推算当生于 1079 年或稍晚。

⑥ 按折可求为继闵第 13 孙，而可大为第 4 孙，可存为第 18 孙，可存生于 1096 年，可求之生年应在可大与可存之间，而距可存更近些，故推测其生年约在 1090 年。

二、宋廷对折氏的政策

北宋朝廷对折氏采取许多特殊政策,它可以归纳为优厚与控制两个方面。优厚政策主要有下列 4 条:

1. 承袭后唐以来的政策,允许折氏世袭知府州之职,通常情况下是终身制,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如有病不能胜任时,则提前换人,如折御勋病,即以其弟承袭。折克柔患眼病,让位于其弟克行。折氏在府州可以“用其部曲,食其租入”。(《折继闵神道碑》)

2. 宋承后汉、后周制,在府州设永安军节度使,提高其地位,但并非刚任知州即赏此头衔,而须论功加封。如折御勋,乾德二年(964)知府州,至开宝二年(969)始擢永安军节度观察留后,折御卿,开宝九年(976)知府州,至淳化五年(994)擢永安军节度使。此后不再使用这一头衔,改用级别稍低的其他官职,如折惟昌为兴州刺史,继宣为恩州刺史,继闵为果州团练使,继祖为康州刺史、麟州防御使,惟忠为简州团练使,克行为秦州刺史,可求为康州刺史,可大为荣州团练使。

3. 折氏权限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至整个麟府路,此路是从属于河东路二级路,含麟、府、丰三州,丰州知州系藏才族王氏世袭,所管地域人口远不及府州。当丰州需要遴选继承人时,朝廷曾诏令折继忠等考察,折氏则压抑蕃官,要改立自己中意之人,以至引起王氏不满,向朝廷告状。(《宋会要》方域 21之十二)麟州也是党项、汉人杂居之地,但知州并不世袭。三州中核心是府州,折氏常兼管麟府路之事,折御卿充麟州兵马都总管,夏银府绥都巡检使,折继闵兼任麟府路驻泊兵马铃辖,折克行兼麟府都巡检使,克禧麟州兵马都监,可求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第十二将,同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折继闵神道碑》、《折克行神道碑》、《折惟忠妾李夫人墓志》)可求曾统率麟府兵 2 万援救太原,后以三州降金,也与其掌管三州之军事有关。

4. 朝廷还给予其他优厚待遇,如允许知州及其夫人入朝,并给予赏赐,如折德、御勋、惟正、惟忠妻刘氏等。政和五年(1115)折可大曾奏:“臣家亦尝贡方物,或遣母妻入觐,盖祖宗眷遇特厚”。(《宋会要》方域 21之八)景 年间,刘氏与子继闵入朝,仁宗“慰劳甚至”,即封继闵为右侍禁。折氏家族往往很年轻就授予官职,如折继闵 7 岁即“以父任为三班奉职”(《折继闵神道碑》)。折氏除世袭府州外,还出任麟府路其他官职,如折继长任百胜寨主,可褒为麟州通律堡兵马都监。更有人出任麟府路以外官职,如折可致为环庆路准备将领,可久为河北第十一将,可与为河东路第一将部将,可规为真定府元氏县尉,可通知岢岚军,彦野为秦凤路第一副将。(《折惟忠妾李夫人墓志》、《折渭州墓志铭》、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 11《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

宋朝廷为何对折氏采取上述优惠政策?这是因为麟府路地处辽、宋、夏交界处,而府州又是该路的核心,宋如丧失此路,河东路就会受到直接威胁,太原如有变故,势必影响宋朝的统治。麟府路又是蕃汉杂居区,党项人居多,如宋方派汉人统治,一旦处理不好民族关系,党项可能投奔西夏,麟府路就会落入夏人之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党项人去统治,而折氏是最佳代表,它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足以统治该地区,又由于它与辽、夏为世仇,绝无叛降之可能。宋廷既然要依靠折氏,自然要给予优惠政策,使之能为宋效忠出力。

宋廷政策还有另一面,即加以控制,不让他成为新的藩镇,具体措施有:

1. 宋廷掌握知州的任免权,对不称职者可以撤换,如折继宣“虐用威刑”,“人用流移”,(《宋大诏令集》卷 188《府州敕榜》)宋廷即将他撤换。对作战失利者降职,如折继闵庆历元年十月之战失

利,免去宫苑使之官。

2. 宋在麟府路屯驻禁军,起初为 2000 人,庆历四年增加到 1 万多人,《长编》卷 152 庆历四年十月壬子)其任务既为御敌,而更重要的是“疑其强盛,别置兵马一司,以视其举动。”(《宋会要》方域 21 之五)此司全称管勾麟府路军马司,其领导职务一般不授予折氏,仅北宋末国家大乱时授予折可求例外。任此职者有大中祥符时的韩守英,天圣时的王应昌,庆历年的康德舆、张亢、王凯,嘉 年的郭恩、贾逵,元丰年的高遵一、王中正、张世矩、邢佐臣,元 年的张之谏、赵宗本,绍圣年的张世永。《长编》卷 78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戊申,《宋会要》方域 21 之五,《长编》卷 133 庆历元年九月庚戌,癸酉,卷 138 庆历二年十月壬寅,卷 185 嘉癸二年五月庚辰,《宋会要》兵 27 之四十二,《长编》卷 290 元丰元年六月戊辰,卷 314 元丰四年七月癸丑,《宋会要》职官 66 之十八,《长编》卷 356 元丰八年五月甲午,卷 379 元 元年六月甲午,卷 437 元 五年正月己丑,卷 485 绍圣四年四月丙戌)他们多以并代路钤辖兼摄,归知并州的河东路经略使领导,其实权大于知州,如庆历元年,知府州折继闵得知西夏将来进攻的消息,即告康德舆,康不信,到夏人来攻时,赶紧关闭城门,致使城郊蕃汉人全被夏人掳杀,折也无可奈何。(《长编》卷 133 庆历元年九月癸酉)

3. 宋对府州,与其他州一样,设置通判一职,以牵制知州,此职一般不由折氏充任,如庆历元年府州通判为张旨《长编》卷 133 庆历元年九月壬申)负责办案的府州录事参军也由审官院铨司选任。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非折氏担任,如府州军事判官杜陟、府州签署判官公事史谭等。(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 7《府州军事判官杜君墓志铭》,《欧阳文忠公文集》卷 11《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

4. 皇 元年(1049),宋在麟府路设走马承道,为皇帝侦伺当地情况,及时上报(孙逢吉《职官分纪》卷 35,《长编》卷 166 皇 元年五月庚申)任此职者嘉 年黄道元,熙宁年全惟几,《长编》卷 185 嘉 二年五月庚辰,《宋会要》兵 4 之六,兵 28 之二十二)元丰年陆中,《宋会要》兵 28 之二十二,《长编》卷 304 元丰三年五月丁丑作“陵中”,按《长编》卷 311 有环庆路走马承受“陆中”,当为同一人,“陵”应为“陆”字之误)贾宗元,政和年杨延宗(《宋会要》礼 62 之四十六,职官 41 之一百二十九)

5. 河东路监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对府州均有监察之权,嘉 五年时,监司不顾朝廷对府州的特殊政策,“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以致(知州折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朝廷知悉后,命知州梁适“密加抚存”,折氏才安下心来。(《宋会要》方域 21 之七)

宋朝采取上述措施,将府州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使折氏只能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劳,不致成为难以驾驭的藩镇

三、折氏的经济

折氏是个大家族,嘉 年间,有 300 多人。(《宋会要》方域 21 之七)他们靠什么维持呢?考其经济来源有下列几方面

1. 府州的租税 折氏世袭知府州,可以“用其部曲,食其租入。”(《折继闵神道碑》)具体数目不详,但府州由府谷县升格,地位虽然提高,管辖范围仍只一县之地。其地北部平衍,水草丰盛,适宜畜牧,南部丘陵,沟壑纵横,多险隘,利防守,而不便耕作,仅河流两岸宜于农耕。其地居民稀少,元丰时 1340 户,崇宁年间,府州仅 1242 户,3185 人。(王存《元丰九域志》卷 4,《宋史》卷 86《地理志》)其租税收入是有限的

2. 俸禄 除世袭知州之官俸外,子孙们有各种官衔者甚多。如折继祖卒时,三子各迁一资,二孙并为三班借职。(《长编》卷 226 熙宁四年九月甲午)

3. 开垦闲田的收益。

4. 朝廷的赏赐。折氏贡马,入朝觐见,作战立功,朝廷均有优厚的赏赐。“折御卿入本朝,尤为太祖皇帝所信任,数下诏书奖谕,赐赆不赀”(《姑溪居士后集·折渭州墓志铭》)嘉元元年,赐折继祖“钱五十万”(《宋会要》方域 21之七);战没时抚恤尤厚,如咸平二年与李继迁部战,折海超、折惟信阵亡。“奏至,即日遣内侍劳问,赐金丹、法酒、锦袍、金带、名马、器币。”(《宋会要》方域 21之四,《长编》卷 45咸平二年秋)

5. 义庄、别业的收入。府州土地有限,折氏便向外发展,在保德州阳“有世遗产”。折可适“置别业于长安,以孤遗,又置义庄于岢岚,以贍近亲”。(《姑溪居士后集·折渭州墓志铭》)保德遗产当指土地、房产,义庄大约仿范仲淹的义田而设,以其租税收入供养亲属,“别业”可能开邸店之类。

6. 边界贸易的收入。府州主要以缯锦换取战马,天圣时一度停止,但随即恢复,“复市如故,而马入岁增”。(《长编》卷 109天圣八年正月己卯)与唐龙镇的互市,有时发生将镇人“邀杀,尽夺资畜”之事,下诏存抚,始恢复正常。(《长编》卷 54咸平六年五月庚子,《宋史》卷 491)

7. 战争的掳获。如至道元年,获辽马千匹,咸平二年,夺李继迁部牛马、骆驼,获辽马牛羊万计,景德元年获辽牛马、铠甲万计,熙宁三年获西夏牲畜万计,元丰四年发夏人窖藏糜谷,绍圣四年获西夏牛羊马 3000余。

以上收入中,租税可能是最重要的,而租税的多少取决于所能控制的人的数量,折氏与夏、辽交战多注重于人口的争夺。淳化四年(993),银、夏州蕃汉族 8000余帐,驱牛羊数万投奔府州,这当是府州最兴旺的时期。到宋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夏兵攻陷麟、府所属各寨,掳掠、屠杀大批居民,麟、府成为两座孤城,后虽解围,民户损失惨重,以至政府不得不于庆历元年十一月下令,蠲免麟、府州今年夏秋租及来年夏租。(《长编》卷 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折继闵又安辑东渡黄河避难的民众,归业者 3000余户。(《长编》卷 152庆历四年十月壬子,《宋史·折继闵传》)比宋初减少多矣。到折继祖时,经济已十分窘迫,嘉元元年(1056)以无钱改葬其父,向朝廷提前支取月俸。(《宋会要》方域 21之七)到神宗熙宁四年,宋筑罗兀城,打通了麟府与延的道路,继祖乘机招降部落 800帐。折克行在任时,又招降了数千家,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宋史》载崇宁时仅 1242户,远没有招降来的户数多,很可能国家的统计只含定居的城村民户,而不计游牧帐落。总之,北宋后期,折氏掌握民户远不及宋初,其经济、军事实力均大幅度下降。到南宋时,折氏很少在各类史书上出现,原因甚多,其中没有原来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是重要原因,绍兴二十八年(1158),朝廷以“折彦质生事素薄”,特“赐官田一十顷”(《宋会要》食货 61之四十九)。这“生事素薄”四字,说明了折氏失去固定经济收入后已下降到可怜的程度。

四、折氏的家风

府州的风俗,“地近边而民知战”、“民不满十岁,皆谙武艺”。(《元一统志》卷 4,引《府谷旧郡志》)其地产良马,在宋朝疆域内,“凡马所出,以府州为最,盖生于黄河之中洲曰子河汉者,有善种出”。折御卿曾向宋太宗进贡名马“碧云”,“上下山岭,如履平地”,“上下如坐安舆”。(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 9)折氏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世代尚武的风气,至有折家将之称。折氏除擅长骑射外,也重视阅读兵书,改进阵法,如折继闵“喜读韬略,务通大义,论古今将帅,识其用兵意”。(《折继闵神道碑》)折克行则“创五军阵法,团为五部,部为一色,以号□□”。(《折克行碑》)

在北宋前期,折氏对用兵以外的知识是轻视的,折继闵见其“部曲有习书数者,辄笞辱之,以谓边兵当以射猎战斗为生活,今更习书数,疲软自是始矣”(《折继闵神道碑》)。此书数当即《崇文总目》中的天文占书类和历数类的书。到折继祖任知州后,此风有很大改观。嘉二年(1057)麟州通判夏倚,因公事至府州,折继祖拿出“图史、器玩、琴博、弧矢之具”供他欣赏。夏倚感慨地说:“虽皇州 绅家止于是尔,信乎文德之遐被也”。还说“其子弟亦粗知书”(文莹《玉壶清话》卷3)。这是折继闵死后五年的事,说明折氏拥的府州 100多年后风气已由尚武向文武兼重转化。

神宗以后,便出现文武兼长的名流,如折可适(1030~1110),从十六七岁开始“从军斩获,至四十余年,无一日不在兵间,每战必克,无不通贯”,“为文长于叙事,作诗有唐人风格”,作为文集 10卷,奏议 30卷,边议 10篇。《姑溪居士后集·折渭州墓志铭》)到宋徽宗崇宁年间,折氏出现了第一位进士,此人便是可适之子彦质。彦质参加抗金战争,曾任高级武职签书枢密院事,同时擅长诗文,所作有《葆真居士集》《时政记》,已佚。现存之文有《种师道行状》及《谪居昌化谢表》(残)等 3篇,诗数首。其被贬至今海南岛时作《渡海》诗云:“朝宗于海固愿也,一苇杭之如勇何。浅著惊呼过又喜,此生是等事尚多。”他虽屡遭秦桧打击,仍表现了镇静乐观的心情。当秦桧死后,平反北归时,又写《北归渡海》诗云:“去日惊涛远拍天,飞廉几覆逐臣船。归舟陡顿能安稳,便觉君恩更涣然”。(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0,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42)

与尚武精神相关,折氏品格勇敢直率,忠厚仗义,《折嗣伦碑》称“临危致命,不顾其死,见义有勇。”《折克行碑》云:“公勇于用兵而仁于拊下。”《折渭州墓志》:“公不事权贵,不为势利所夺。”朱熹称赞折彦质“精忠壮烈”。(《朱文公文集续集》卷《答折完》)戏曲小说中余太君忠良气节亦是这种家风的反映。当然,也有个别不能保持晚节者,折可求降金即是一例。

五、折氏的婚姻

折氏的婚姻可从娶妇、嫁女两个角度考察

先说娶妇。现在就我所搜集到的材料分析,自折德至折彦文 11人,娶妇 20人,其中妻 19人,妾 1人,娶妻最多者折御卿共 4人。20人中分属 13姓,其中张、王各 3人,梁、刘、慕容各 2人,路、苏、杨、郭、曹、陈、赵、李各 1人。13姓中,慕容氏为鲜卑族,王氏可能出自丰州藏才族(属党项族),此系从丰州王氏娶折氏推测。其余均为汉族。由于长期与汉族通婚,其面貌特征有较大变化,夏倚见到折继祖,说他“不类胡种”。

折家 20名妻妾中,可确知身份者 3人,折可存妻张氏,父为吉州刺史张世景。折彦文妻曹氏,是仁宗曹皇后的侄曾孙,父为忻州刺史曹普。折惟忠妾李氏,“世居开封,系出仕族”。

结婚年龄,男子只能据其生子时间推测,折德(917~964)22岁生御勋(938~977),其结婚约为 21岁,折御卿(958~995)21岁生次子惟昌(978~1014),生长子惟正约在 19岁,其结婚约 18岁。女性中可知者 2人,折彦文妻曹氏 17岁,折惟忠妾李氏 13岁。看来,结婚年龄偏早。

20人中,再嫁者 1人,折惟忠妾李氏,夫死时年 35,再嫁豪族田氏。

其次说嫁女。现有材料可知,折继闵 7女,克禧、克行、可存各 1女,可适 3女,不可确知父名的折氏女 3人,共 16人,婿凡 12姓,其中王姓 3人,慕容、李姓各 2人,刘、郭、张、曹、陈、彭

范、朱、魏各 1 人。

婿与媳姓相同者有王、刘、慕容、郭、张、曹、陈、李 8 姓。其中有的与折氏有世婚关系,如折彦文妻曹氏,是彦文姑母的长女,折与王、慕容可能也有类似关系。

婿的身份,继闵 7 婿,其中 1 人为进士,其余均有官职:右侍禁、皇城使知邕州、皇城使知戎州、左藏库使、江南东路兵马都监、东作坊使、三班奉职。可适 3 婿为左班殿直(2 名)、内殿崇班。可存婿进士范圭,其曾祖为翰林学士范镇(范圭《折可存墓志铭》,李石《方舟集》卷 15 第 19 页)克行之婿为知忻州曹普,克禧婿为东头供奉官、权麟州横阳堡兵马监押张天成。另有 3 名折家女婿为知丰州王承美、通判魏良佐及皇城使李中言。(郭象《睽东志》卷 5,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 97,《李显忠祖李中言追封和国公制》、《李显忠祖母折氏特赠魏国夫人制》)魏自长沙接其妻,可能是彦质之婿。

以民族而言,王承美为藏才族,继闵二婿慕容令、慕容令仪为鲜卑族,李中言乃南宋大将李显忠之祖,“世为苏尾九族都巡检使”,则亦为少数民族,其余为汉族。

婚姻大体选择地位相当的州级长官家庭,没有中央一级官员,唯曹氏曾祖曹佺,乃宋仁宗后之弟,但毕竟隔了好几代,地位已不显赫。折氏不与平民或商人为婚,也未发现同姓为婚现象。

折氏家族 300 余人,规模不太大,力量不如李氏集团强,这可能与地处边疆,婚姻圈中缺乏豪族有关。党项族李氏集团的强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与豪族结亲,《宋史·夏国传》称“(李)继迁复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

六、折氏的丧葬

宋代家族墓葬的考古发掘资料甚少,所幸折氏墓葬,戴应新已作调查,发表于《折氏家族史略》中,惜所叙过略,且未绘图,令人遗憾。从所公布材料分析,折氏丧葬制度有如下特点:

1. 实行族葬。历任知州及其家族的墓地有两处:一在府谷县孤山镇东 5 里的李家,该地曾保存有折嗣伦碑,碑文提及“祖茔之左右”,则其先世亦葬于此。考嗣伦之父宗本始任振武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始有麟府之地,墓地始祖应为宗本。又折继祖迁葬御卿,惟忠墓于天平山,可见此地原葬有折宗本以下共六代人,御卿、惟忠墓迁葬后,已下葬的同辈人当仍在此地。由于早期人数尚少,故墓地规模较小。

其二在孤山镇南 10 里的杨家沟,宋代名天平山,离李家 8 里。葬折御卿以下六代人,由于人数较多,墓地规模比前者为大。

墓葬的排列方式,李家无资料可考,杨家沟虽作调查,惜未发表墓葬分布图,难以判断其是否按汉族的昭穆制度排列。但据已有资料,尚能看出排列是有序的,大体上按辈份大小自西向东分布。最西端应为始祖折御卿,其东当为其子惟忠,又东为继闵,继祖,又东数十米为继闵子克行,又东为克行子可大。可大墓在墓区中部。晚期处于被西夏攻陷前夕,排列似不太规范,如折可复夫妇在可大墓之东,即墓地之东区,可复为继闵之长孙,是可大的长兄,按上述墓葬辈份由大而小自西向东排列的惯例,可复不该排在可大墓之东。推测这样排的原因是可大为知州,官品高,又死在前,故先葬在其父之东。可复官为武功大夫,正七品,从其墓仅有砖志,而无石刻墓志看,其下葬已离府州失陷不远,故下葬草草,已不讲求排列程序了。

2. 迟葬。折氏族人往往不及时埋葬,如折继闵,皇 二年(1050)卒(一作皇 四年卒),至嘉 二年(1057)才下葬。折克行,大观元年(1107)死,至政和元年(1111)才与妻和义夫人同葬。

此时,又“尽举族人二百余丧葬之”。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折彦文妻曹氏死于宣和五年(1123),二人均至建炎四年(1130)十月四日才葬。折惟忠妾李氏熙宁五年(1072)死,至政和元年(1111)葬。以上迟葬4至7年较多,个别则迟达40年之久。

3. 迁葬 折御卿,至道元年(995)卒,折惟忠,明道二年(1033)卒,原葬于李家,嘉元元年(1056)十二月,折继祖将惟忠改葬于天平山。折御卿墓志载“嘉”“岁十月甲戌”“一新,莹兆再完”,考十月甲戌为嘉元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嘉二、三年十月均无甲戌日,可见折御卿亦应是继祖于嘉元元年迁葬于天平山,时间比惟忠之迁早两个月。

为什么折继祖要迁葬祖、父之墓呢?从折继祖碑可以看出,继祖死后,其弟继祖并没有立即将他埋葬,而是推迟到嘉二、三年十月十八日葬于“天平山之先莹”,在这六、七年时间内折继祖考虑李家太小,需另择墓地,到嘉元元年选定新址时,他又考虑还不能只埋其兄,因为这样一来,其兄成了新墓地的始祖,将来他死了,往那儿埋?他自然要考虑迁葬其父,然而当时叔父惟质尚在世,以其父为始祖,将来惟质死后怎么葬?唯有将其祖迁来,作为新墓地的始祖,这些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确定了这一方案,自然就出现了上述结果,按辈份先后,先迁祖,次迁父,后葬兄。

4. 嫡庶有别 折氏夫妻可以合葬,妾则葬于乱坟堆中,即使妾之子已贵为知州,妾也无资格与夫合葬,最典型的例子是折惟忠之妾李氏,其子继祖已为知州,她不能与夫合葬,但她毕竟与一般妾不同,为了妥善处理身后事,由其孙克禧请示知州折可大,经批准,另择地埋葬,地点在今府谷县傅家,距天平山10里。碑文中特别说明:“其亡也,不崇信(指折惟忠)之兆者,不敢乱嫡庶之分;其葬也,不厝诸姬之域者,盖以尽子孙之孝”。

5. 旁支别葬 折氏旁支折可适葬地在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其墓志云:“葬公军之北安仁乡道生谷武家会领军墓之西”。领军指其父左领军卫上将军克,克高祖德源,与御卿之父德为亲兄弟。可适曾“置义庄于岢岚,以贍近亲,而为松楸洒扫之事”。很可能从德源开始已另立门户,葬于岢岚。

南宋金时期,折氏分成南北二支,南支折彦质葬于潭州(今长沙),北支葬地不详。

6. 风水 折氏早期葬地李家,地处孤山河北半坡上,虽说是面山背水,但地势低缓,无山岗形胜,看来开创之初还不太讲求风水。杨家沟(即天平山)墓地情形完全不同,墓地天平山半坡,山高200米,两侧为小风,前临沟水,俨然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很可能是折氏日益汉化后,受风水说影响下的结果。^①

〔责任编辑 许正文〕

^① 本文原附《府州折氏世系表》,详列10代折氏世系及婚姻关系,因篇幅较大,暂时割爱。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O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by Yang Qiuba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comes internally from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take the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as the material base, and the special period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is embodied mainly in the controlling power, including the dominating place in certain important trades and fields,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capital, the competition power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itself, its participation and controlling role in th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dominating role of the enterprises which is state- owned or held by the state capital.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should be preserved in the direction of increasing the controlling power.

A General Factor Analysis on the Option for the Pattern of Social Security by Ren Baoping

The option for the pattern of social security is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the economic operation status in the period, and the guidance of economic theory. Strategically speaking, a pluralistic coordinating pattern should be adopted in China. The key approach is to build a system in which the contents of social security, the modes of organization and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a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cities and countryside. Tactically speaking, the starting point in cities should be the unemployment and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in countryside should be help- the poor work.

Turn of the Century. Thinki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Liu Xuezhi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 e. ,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learning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e non-Marxist philosophies and the modern scien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the foreign philosophies and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 future Chinese philosophy might be a pluralistic structure with one guiding aspect. The future road for the Chinese philosophy will b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which is suitable to the Chinese practices, 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is modernized and recognized by the whole world.

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Question “Fusang State being in America” by Zhang Weishen

Fusang State in the Book of Liang History was actually in America, and set up by the Chinese Luo people influenced with the Yin culture.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Buddhist monk Huishen is that he was the first man who found the Fusang State and left his name behind.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he Family

by Li Yumin

The She Family came from the Dangxiang Nationality, and was the only family hereditarily to be the prefect of prefecture “Zhou”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She Family, with some of its members being the high 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court,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ar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Liao, Xia, and Jin. The She Family was assimilated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through intermarriage, and had both military and literary abil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Song's cultural policy.

The Hereditary Families of Eunuchs in the Tang Dynasty

by Du Wenyu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imes of the Tang dynasty a lot of hereditary eunuch families appeared through promoting their own relatives and juniors, thereby occupying the places of high 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courts. As a result, the fashion of adopting sons in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constituted one of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se periods and even had some influences in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Cultural Pattern and Destiny of the Xueheng Scholars

by Li Jianzhong

The scholars of the Xueheng School were considered as the conservatives in the argument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cultures in the early times of this century. Being investigated attentively, the cultural pattern advocated by the scholars of the School was astray in action but showed a new cultural ideal for creating a future world.

Fengzhi and Rainer Maria Rilke

by Li Li

Both Fengzhi and Rainer Maria Rilke are poets with the temperament of introspection. The metaphysical style, the objective mode of perception, the concise language and the form of sonnet embodied in Fengzhi's Collection of Sonnets show us the succession relation to Rainer Maria Rilke. No poet except Feng in China understands Rainer Maria Rilke's poetic essence and makes some creative progress.

Ability Standard: A Kernel Concept of New Cultural Values?

by Huo Yongqua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further study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ability standard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kernel concept of new cultural values in the next century. The value of ability standard is still an ideal design rather than a necessary status practically in motion. From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on the ability standard policy enforced in the West has deepened the crisi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rior option should be the success standard and the personality standard that will replace the ability standard to be the values of new culture in the next centur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of Affec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by Liu Jingduo and Quan Lixia

The effects of factors of cognition and affection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Their concrete mode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the dynamic self-organization. The moral intern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activation of both moral cognition and affection factors, which is influenced to a great extent by the education ideas and patterns the educators hold.